



文化荆州

二〇二四年第五十七期 总第一百三十二期
知荆州 爱荆州 兴荆州
荆州市融媒体中心 荆州市委宣传部 荆州市文旅局 荆州市文联 联合出品

族与宋玉的家族传承关系存疑,无法确认其真实性。
通过对古籍资料的仔细梳理和现场考察,本文作者得出这样的结论:宋玉的江陵故宅或许位于得胜街西边、溪峨山一带的陵埠高地上,临近北江(今太湖港)。这一推断虽然尚未得到确凿的考古证实,但已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探索方向。
在此,“文化荆州”呼吁广大读者和专家学者继续关注和支持对宋玉故宅等历史文化遗迹的探寻工作,携手努力,共同揭开这些历史谜团的面纱,为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贡献力量。

荆史寻踪

宋玉故宅何处是

□ 楚之思

关于两千年前的一个诗人,他的吟诵,他的叹息,他的眼界,他的天空,当你穿越时光,去追寻它的踪迹,仿佛他就在你身边,他的灵魂在与你交流。时空如此遥远,却又近在咫尺,这是一种神奇的感觉,关乎于生命及那飘渺之存在。

很多人知道楚国诗人屈原,却不知道宋玉。宋玉是屈原的学生,其词赋作品清新华丽,文采飞扬,是继屈原之后楚国最有才华的诗人,人们把他们两人合称屈宋。

据《荆州府志》的记录,宋玉宅在城北三里,唐代吴融的诗有“临江旧宅指遗基”,以此确定宋玉宅在城北江江,因此把它作为北江在荆州城北的一个旁证。

11月,我看到2017年的一篇新闻稿,标题是“楚国第一美男子”宋玉的故宅遗址发现荆州,第125代子孙仍在附近居住,也被称为美男子……”,这让我很惊奇,难道宋玉故宅遗址现在还存在吗?据这篇新闻稿件介绍,这个宋玉故宅在城北红光村宋家湾,那里住着宋氏家族,是宋玉的后裔。一个家族在一个地方绵延两千多年,这样古老的家族我目前在这一带还没有发现过,这是真的吗?

但我马上产生了疑惑,宋玉故宅临江,只可能在北江边,宋家湾离古城三四公里,远离北江,宋玉宅怎么可能在那里的村子边呢?要么古代诗人弄错了地方,要么宋家湾的宋氏家族与宋玉家族并无传承关系。

据这篇新闻稿介绍,宋家湾宋氏家族有流传的家谱,可以证明他们与宋玉的世代传承关系,但稿件却没有提供他们家谱中的确定信息,究竟不可信呢?我看到给记者提供消息的是该村村民宋祠平,他的字辈为“祠”,联想到宋家台也有“祠”字辈的人,我猜测北门外外的宋氏家族与宋家台的宋氏家族应该是一个家族的,因此,我去村中访问,并查看他们的家谱,果然他们是同族,村中老人也知道北门外拍马(即今红光村)宋家湾跟他们是同族即使用统一字排,族谱都是相合的。

编者按:

在历史的长河中,许多珍贵的文化遗迹如同散落的珍珠,其具体位置因年代久远而变得扑朔迷离,成为后人探寻的难题。本文所探讨的宋玉故宅,便是这样一个典型例子。

据史籍记载,宋玉故宅有三处可能的位置,分别位于宣城、归州和江陵。然而,随着地形地貌的变迁和时间的流逝,这些记载已难以成为确凿的证据。例如,有传闻称宋玉故宅位于荆州城北红光村宋家湾,但经过本文作者深入调查,发现这里的宋氏家族与宋玉的家族传承关系存疑,无法确认其真实性。

通过对古籍资料的仔细梳理和现场考察,本文作者得出这样的结论:宋玉的江陵故宅或许位于得胜街西边、溪峨山一带的陵埠高地上,临近北江(今太湖港)。这一推断虽然尚未得到确凿的考古证实,但已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探索方向。

在此,“文化荆州”呼吁广大读者和专家学者继续关注和支持对宋玉故宅等历史文化遗迹的探寻工作,携手努力,共同揭开这些历史谜团的面纱,为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贡献力量。

村里曾主持续修家谱的宋继乾老人告诉我,他们家族的先祖就是从北门外拍马迁移过来的。宋氏家族1996年续修谱中的一篇谱序,记录非常明确,他们的一世祖为江南和州府历阳县历阳村人(今安徽和县),被封为武略将军,于洪武九年镇守荆州,死后葬于北门外拍马。他有三子,我镇宋氏家族为次子世系,北门外宋家湾宋氏家族则为长子世系。因此很清楚,北门外红光村一组宋家湾宋氏家族在那里繁衍的历史仅有六百多年,他们不可能是两千年前楚国宋玉的后代,因为他们的世系关联无法明确追踪,也就是说,那村边的宋玉故宅遗址不是真的。

因此,我们还是应该以历代诗人的描述为根据,因为那是他们亲身游历的经历,他们真实看到的,通过诗歌描述出来,这是非常确切的证据。

关于宋玉故宅,史籍记录有三处,一在宣城,一在归州,一在江陵。宣城是其出生成长的地方,为祖宅。归州,应该是他拜师于屈原,跟随屈原学习辞赋的地方。而江陵宅,则是他任职于楚宫廷,伺事楚顷襄王的住所。

宋玉的江陵故宅,唐代余知古的《渚宫故事》中有这样的记载:庾信因侯景之乱,自建康逃归江陵,居宋玉故宅。庾信是南北朝时期文学家,梁朝大臣,他最著名的作品为《哀江南赋》,其赋中有“诛茅宋玉之宅,穿径临江之府”,这说明余知古的记录是可信的,同时也证明宋玉之宅临近江边,确定无疑。

在唐代,宋玉故宅的遗迹应该还存在,是诗人常常去探访的地方,前面提到的吴融,还有李商隐、罗隐、杜甫等,都曾去探访,且有诗作留世。杜甫既探访过归州宅,也探访过江陵宅,并都作有咏怀之诗。“曾闻宋玉宅,每欲到荆州”,正是他探访江陵故宅后所作。

宋代时,宋玉故宅遗迹可能不存在了,因为查不到诗人游故宅的诗。三苏到江陵城时,探访过渚宫、绛帐台、息壤,却未见其写诗吟诵宋玉故宅,可见这时临江故宅已被遗忘。

时光悠远,千百年来,地形地貌已发生根本的改变,我们能否找到关于宋玉故宅的蛛丝马迹呢?这似乎没有可能,不过,根据我前面文章的探讨及古籍资料的确定信息,宅在北门外三里,临江,我认为这个地方应该在得胜街西边,溪峨山那一带。

网上查看百度地图,我发现一个地方非常特别,直觉与宋玉宅似乎有关联。那地方是原来老江陵县的党校,究竟有何由来却不知。请好友去打听,得到这么几点信息:一、城北得胜街西有个秦家巷,此巷往西可到太晖观,党校就在此小路中间,以前这里居住着太晖村民,现在都搬迁了;二、有个古老传说,这一带地形如一个展翅凤凰,得胜街为凤身凤头,党校这儿地势较周围高,正是凤尾,也有人说得胜街以前称为凤凰山;三、得胜街西,以前北门外殡仪馆后面有一个大池塘,为何这里有这么一个池塘呢?据种林访问,附近老人说,这以前是一条东西连通的河,西边往党校、太晖观方向。原来,这池子是古河道的遗迹。

这几条信息看似寻常,仔细分析却很重要,能说明问题。从凤凰地形的传说来看,这儿自古就是一个陵埠地带,符合封邑筑城的条件(“近处无高山,所有皆陵埠”江陵名称源于此),考古人员在这儿发现古城址却不奇怪了。关键是,这座被考古人员命名为的溪峨山城,我越来越确信它就是《水经注》描述的江陵故城。

宋玉是辞赋大家,名闻天下,深受楚顷襄王宠幸,他选择在临近渚宫的江陵邑城内的陵埠高地建立宅院,这太合适不过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即太晖临江。此次有一个重大的发现,可能目前还没有人想到这个问题,前面谈到的那一条东西向的古河道,在我看来,它应该就是北江的遗迹,北江淤塞之后,故宅边就留下一道小沟渠,就是说,千百年前,原江陵县党校这块地方更靠近北江,唐朝诗人看到的宋玉的临江故宅,不正是在这块高高的陵埠之上吗?我的推断是否有道理?

文史趣谈

唐代「三杨」与荆州的文缘

□ 余大中

唐代大历年间,也就是公元766年至779年期间,杨凭、杨凝、杨凌兄弟三人,接连进士登第,盛名一时,传为美谈,号称“三杨”。其中,杨凭担任过京兆尹、太子詹事,杨凝官至兵部郎中,杨凌官至大理评事。而且,“三杨”皆负诗名,并且都有作品传世。笔者查阅史料,很想了解他们兄弟三人于荆州的文缘,但目前只发现了杨凭和杨凌的诗各一首。特予赏析,以飨读者。

七言绝句《送客往荆州》是杨凭的代表作,也是他与荆州在文学创作上的显著联系。其诗曰:“巴丘过日又登城,云水湘东一日平。若爱春秋繁露学,正逢元凯镇南荆。”前两句,描述友人经过巴丘后又登上城池,看到湘东地区云水相接、一片平静的景色,交代了友人行程的地点以及所看到的自然景象,为整首诗营造出一种开阔、悠远的氛围。后两句,借用春秋时期知名学者董仲舒的著作《春秋繁露》,代指儒家经典和学问;而元凯,乃是春秋时期晋国大夫赵衰,曾镇守南荆,是古代贤才。这里用来勉励友人,要像董仲舒那样博学多才,像赵衰那样在荆州有所作为。这首诗以景抒情,借对友人行程中所见景色的描写,以及对友人前往荆州的美好祝愿,表达对友人的送别之情。

杨凌所作的是一首五言绝句,题为《贾客愁》,诗中写道:“山水悠悠,逢谁即滞留。西江风未便,何日到荆州。”贾客者,商人也。这是一首描绘贾客旅途艰辛与渴望归期的诗。商客行船的水路漫长遥远,“悠悠”二字不仅描绘出山水之间路途的漫长,也暗示了贾客行程的单调、孤寂以及心中的惆怅。行船最怕遇到浅滩等阻碍,一旦遇到就会耽误行程,这表现出贾客在旅途中经常遭遇这种意外的阻碍,进一步加重了他的烦恼和焦虑。风向对于行船来说至关重要,如果风向不顺,行船就会变得艰难且缓慢,这里体现出贾客对自然条件的无奈。什么时候才能到荆州呢?荆州,是贾客此次行程的目的地,也是一个商业活动较为频繁的地方。贾客渴望尽快到达,但路途上的种种困难让他对何时能够抵达荆州充满了担忧和不确定,所以才有了标题中的一个“愁”字。整首诗,山水之美与旅途之苦交织在一起,情感真挚而又深刻,读后令人既感到无奈,而又充满了期待。

至于杨凝,在仕途上曾担任过山南东道节度使樊泽的掌书记,樊泽移镇荆南,杨凝亦随之。山南东道节度使的治所设在襄州(今湖北襄阳),其辖区包括今湖北、河南、陕西三省的部分地区,其中包括荆州。而荆南,则代指荆州的地域。因此,笔者认为,杨凝很可能有机会接触到荆州的事务和人物,对荆州有一定的了解。目前,虽然还没有查阅到杨凝直接写荆州的诗,但他的诗主题广泛,包括送别、咏物、赠别等。这些诗中可能蕴含着对荆州的描绘或情感表达,只是没有直接点明荆州而已。对此,值得进一步研究。

三国故事⑧

吴王庙村

□ 邓英连

吴王庙村在乌林镇驻地东南四公里,因吴王庙而得名。吴王庙南临江,北依湖。庙左有一湾人家,叫“月亮湾”,庙前是一个13.5公顷水面的深潭,叫“星潭子”。“月亮湾”似嫦娥娟娟,“星潭子”如明星璀璨。

庙的正中大厅神龛上供四位木雕神像。吴王孙权居中,方颐大耳,目有精光,英俊潇洒。左周瑜手握宝剑,雄姿英发。右鲁肃,恭立颌首,胸有成竹。神龛两边有木匾对联。大厅左侧墙上重修吴王庙简介及古今诗人题诗。吴王庙村人茶前饭后,乘凉休闲,无不对吴王孙权的事迹津津乐道,讲起来眉飞色舞。

三国时期,这里是江口沙洲,周瑜曾在此扎营,孙权有军国大事就来与周瑜商议。一天,江南小乔随孙权视察江北,与周瑜军营相会。人们无不称赞小乔的美貌。白皙的皮肤,纤巧的五官,苗条的身段,亭亭玉立,婀娜温柔,像水仙似的。小乔亲自为吴王孙权和都督周瑜用军锅做饭。她一律用“星潭子”内和潭边的动植物做菜。“绿豆饭”可口,“麻姑嫩”甘甜,“蒿菜煮黄颡”汤鲜美,“糍粑鱼香扑鼻,黑壳鲫鱼肉质细腻。酒席宴上,小乔又为吴王和夫君表演了优美的舞蹈——《呦呦鹿鸣》和《凤求凰》,四位将士以剑伴舞,小乔舞姿轻盈柔和,军士伴舞阳刚矫健,吴王孙权情绪高涨,酒宴气氛热烈。

吴王孙权经常为军机大事征求周瑜意见。后来,吴国太招刘备为婿,致使吴王孙权赔了夫人又折兵;又有白衣过江,袭取荆州,公走妻,父子殒命,两项大计都是吴王和周瑜当年在江滩军营制定。

孙权嫁妹当天,妹妹孙尚香上轿前,强行要哥哥孙权将荆州送给她作陪嫁的嫁妆,如达不到要求,她不上轿。众宾面前,孙权无奈,只好答应。妹妹还要说:“口说无凭,立字为据。”孙权照办,妹妹将文书放在新娘衣袋内。孙权则提出抱妹妹上轿。此时大厅外鞭炮齐鸣,锣鼓喧天;大厅内贵宾欢天喜地,道贺声迭起,场面热闹非凡。孙权抱着妹妹向前走,趁机将妹妹衣袋内文书拿走。导致后来两国争荆州,东吴说刘备欠借荆州不还,蜀国说荆州是孙夫人的陪嫁,有各国贵宾作证,说孙权陪嫁又反悔。为了纪念孙权决策江口沙洲,建功立业的伟绩,当地村民公议修建吴王庙,并改村名为吴王庙村,而且村民一直保留哥哥抱妹妹出嫁习俗。

(未完待续)

湘鄂西红军在江陵的成长足迹(二)

□ 陈诗军 杨本滋

红色印记

随着游击战争的发展,沙岗白鹭湖根据地进一步巩固和扩大,国民党江陵、潜江、监利当局深感惶恐,欲除此心腹大患。1929年4月初,三县之敌欲取两面夹击之策一举摧毁沙岗白鹭湖根据地。东北之敌由江陵县铲共团总龚伯钧指挥,东南之敌由国民党监利县长田立功率领。4月8日,龚伯钧率领龙湾、徐李市、老新口、张金河、土地口5个地区的团防共400余众,自东北方面向沙岗扑来。彭之玉、陈香波指挥根据地军民,在敌必经之路贺家湾地里设伏,一举击溃敌军。龚伯钧拍马而逃,陈香波带领战士们乘胜追击二十余里,在肖家场将龚击毙。田立功把进攻沙岗的时间误当成农历三月初一(4月9日)。第二天,田立功耀武扬威地乘坐八抬大轿,率300多名精兵强将直扑沙岗。沙岗军民早已恭候多时,当田军一到,伏兵四起,田军见此阵势,不战而溃。田大失色,弃轿而逃。战斗中缴获了四十余支枪和大批子弹,游击队武器装备大为改善,战斗力明显增强。

进攻沙岗的地方反动武装惨败后,敌人加紧对沙岗白鹭湖根据地进行军事“围剿”。国民党地方反动势力,出动驻郝穴、汪家桥等地的国民党军,妄图对沙岗白鹭湖根据地形成军事包围。特委闻讯后立即调鄂西游击大队所属各中队增援沙岗,但因路远,游击队赶到之前,1929年6月11日(农历五月初五)上午,敌人从东南和西南进攻沙岗,大肆烧杀抢掠,街肆尽变瓦砾,村井几成焦土,根据地蒙受空前劫难。第二天,鄂西游击大队赶到沙岗,与国民党军展开激战于沙岗附近的青阳宫,沙岗军民也赶来参加战斗,取得消灭80余名敌人,缴获大批枪支弹药、马匹的胜利。但游击队也损失不小,伤亡者达40多人。特委军委书记、游击大队长邹资生在追击敌人中,被敌冷枪击中下

腹,光荣献身。战斗结束后,根据地军民以极其悲痛的心情,在沙岗朱家台为邹资生举行隆重葬礼,将烈士安葬在西河桥头。

“由于当时游击区的扩大与游击队的猛烈发展,1929年夏,一、二、三中队会师于江陵之严李家场(解放后划监利)。改编为游击总队,周逸群任总队长,段德昌为参谋长。”“大队所属三个中队,人枪约三百余,共约千余人,其声势之浩大,震动了洪湖、白鹭湖、长江与汉水之间的广大地区。”(1945年7月许光达回忆录《红六军历史材料》)

鄂西游击总队根据中共六大精神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军经验,加强了总队党的建设。游击总队设政治部,大队、中队设党代表,以中队为单位设党支部,充分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发挥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革命武装迅速发展壮大。随着游击战争不断取得胜利,革命武装力量不断发展壮大,沙岗白鹭湖根据地更加巩固,区域也不断扩大。党的组织也相应得到发展,区委由原来的6个增加到8个,党员发展到600多名。郝正、普济两个区建立了苏维埃政权,白鹭湖根据地扩大到方圆五十里。

鄂西游击总队于1929年12月20日正式改编为中国红军独立第一师,师长段德昌,党代表周逸群。下辖3个纵队,共五六千人。

红六军在江陵普济汪家桥成立,洪湖革命根据地建立

“为巩固和扩大洪湖革命根据地,尽早建立鄂西各县苏维埃政府,特委决定第一、第二纵队会师江陵”(《洪湖革命根据地史》)。

第二纵队组建后,在鄂西特委的指挥下,于12月15日攻下江陵郝穴,产生了较大的政治影响。后又向普济观、黄彩洞、沙岗一带发展。此时,鄂西特委及第二纵队在在监、沔活动的第一纵队之间的联系不时中断,难以统一指挥。

为巩固和扩大鄂西根据地,尽早建立鄂西苏维埃县政府,特委决定第一、第二纵队会师江陵。

在此前后,党中央为加强湘鄂西红军的领导力量,先后派李子扬、许光达、王一鸣、王鹤、周容光、周小康和柳克明(柳直荀)、孙德清(孙一中)、卞继勋等人来鄂西工作。柳克明到达洪湖后,遵照中央指示和关于成立红六军及红四、红六军会师的计划,以中央军委巡视员身份写信督令第一纵队到江陵与第二纵队会师。第一纵队接信后即回师西进,途中于城垌和陈沱子口打了两位,获枪40余支。第二纵队自石首出发,收编了江陵熊家河常练队,继又攻取了普济观和沙岗,获枪50余支,实力进一步增强。

1930年2月5日,中国红军独立第一师第一纵队、第二纵队在江陵普济汪家桥胜利会师。鄂西特委召开军事会议传达中央指示,举行全军官兵大会,宣布中国红军独立第一师升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军长孙德清(不久因病离职,由卞继勋接任),政治委员周逸群,副军长段德昌,参谋长许光达。红六军下辖3个纵队,第一纵队司令员由段德昌兼任,政治委员王鹤,下辖4个大队,共12个中队;第二纵队司令员段玉林,政治委员周容光,下辖3个大队,共6个中队;第三纵队由长阳游击队整编。此外,军部及纵队尚有若干直属部队,全军约七千人。

鄂西特委为加强党对红六军的领导,改进红六军的政治工作,以特委和中央巡视员的的名义,组成红六军党的前敌委员会。前委委员有孙德清、段德昌、段玉林、王鹤、徐昌贵、张传贤(第一、第二纵队士兵)及中央派来负责军队党务工作的一位干部共7人。候补委员为许光达、李子扬、王一鸣3人。“第一次前委会议上,决定以3人组成常委,以王一鸣为书记,孙德清为宣传委员,中央派来的同志任组织委员,在未到以前由许光达同志代理”。